

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與兒童 行爲問題之相關研究

張虹雯 郭麗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學系

摘要

本研究主要以家族系統理論學者Bowen所提之「三角關係」概念為理論依據，試圖了解兒童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與其行爲問題間的關連性，並探討性別與出生序等變項的影響。本研究共抽樣526位有效樣本，並依據受試樣本在研究者自編的「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量表」以及「兒童行爲檢核表」的得分，進行統計分析，得到下列的結果：1. 男女童在父母爭吵時成為代罪羔羊的程度有顯著差異存在，且男童比女童容易成為代罪羔羊；而在跨世代聯盟與親職化的得分則無性別上的差異。男女童在內化行爲問題上的差異未達顯著差異水準；而在外化行爲與全行爲問題兩個向度上皆達到顯著差異水準，且男童比女童出現有較高的外化行爲與全行爲問題。2. 不同出生序兒童在跨世代聯盟上的差異達到顯著水準，且在事後考驗中發現老么在跨世代聯盟上的情形顯著高於老大；不同出生序兒童在代罪羔羊與親職化向度上的差異則未達到顯著水準。不同出生序兒童在內化行爲、外化行爲與全行爲問題上的表現沒有差異。3. 代罪羔羊與親職化分別與兒童行爲問題呈顯著正相關與負相關，跨世代聯盟與兒童行爲問題之間則無顯著相關。4. 親職化與代罪羔羊可有效預測女童的內化、外化與全行爲問題，以及男童的外化與全行爲問題；親職化可有效預測男童的內化行爲問題。但親職化與代罪羔羊的預測方向不同，親職化愈高的小孩，行爲問題的發生率愈低，而代罪羔羊的程度愈高，行爲問題的發生率也就愈高。跨世代聯盟則無法預測男女童的行爲問題。

關鍵字：三角關係、代罪羔羊、兒童行爲問題、家庭系統理論、跨世代聯盟、親職化

緒 論

早期在探討有關兒童生活適應或行爲問題時，最先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是家庭系統中的親子次系統對兒童的影響，主要的研究變項是親子關係與父母管教態度。隨著研究的探索與家庭系統理論的盛行，國外有愈來愈多的學者與研究者認爲家庭中另一個次系統，也就是夫妻次系統才是影響親子互動與兒童行爲問題的主要原因，其中婚姻衝突更被視爲是影響兒童行爲問題最主要的因素（Bowen, 1978; Davies & Cummings, 1994; Emery, 1982; Erel & Burman, 1995）。許多學者強調Bowen的三角關係概念在解釋父母婚姻衝突或父母爭吵對兒童適應與行爲問題影響的重要性（江睿霞，民83；呂翠夏，民82；Grych & Fincham, 1990; Jenkins, Smith & Graham, 1989; Jenkins & Smith, 1991），但鮮少有研究直接測量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對兒童行爲問題的影響，其原因除了缺乏直接測量有關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量表之外，缺乏對三角關係的清楚界定以及分類也是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除了發展由兒童自填的「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量表」之外，兒童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與其行爲問題之關連，以及性別與出生序這兩個變項如何影響兒童涉入三角關係，均爲本研究探討的範疇。

一、三角關係之探討

和諧的婚姻關係是大多數人所渴求的，但相愛容易相處難，兩個來自不同家庭的個體很難避免摩擦。Bowen（1978），Kerr與Bowen（1988）認爲每個人在與他人形成的重要關係中，都存在有如何在互動過程中維持個體化（individuality）與集體化（togetherness）平衡的困難，他們不是因爲滿足情緒的需要而喪失其自主性，就是因爲害怕失去自我而逃避與他人的情感連結，而焦慮（anxiety）則是每個人掙扎於如何與他人維持親密性但同時又能保有自己個別化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產生的情緒狀態。

Bowen（1978）曾指出家庭系統處理夫妻之間的焦慮的三種方式：第一種方式，夫妻直接面對與處理衝突。第二種方式，夫妻中的一方代替緊張的兩人關係生病，這時原本的婚姻衝突則被忽略掉，但長期下來，沒有生病的一方被賦予過多的責任，而生病的一方則負擔過少的責任。第三種方式，夫妻拉小孩進入其關

係中，形成三角關係，用以減緩夫妻關係中的緊張與焦慮。他認為夫妻用三角關係的方式來減低其婚姻衝突是自然的、合乎健康的，但一旦第三者的人選固定，且互動模式根深蒂固的話，三角關係就有害了。

(一)三角關係的運作與內涵

三角關係的概念最早是由Bowen於1966年所提出來的 (Richie, 1986)。他指出三人系統是維持穩定情緒系統的最小單位，當兩個人的情緒系統面臨壓力下時，會招募第三者進入這個系統中，以減緩緊張與焦慮，恢復功能的穩定，而這樣的過程通常是無意識的。在家庭系統中，三角關係多發生在父母與小孩的身上，分化愈低的夫妻愈容易藉著三角關係的機制來減緩彼此之間長期存在的焦慮，而小孩通常是最容易被捲入三角關係的人選，很容易就成為父母衝突或衝動的接受者。Bowen的概念開啓了後來的研究者對三角關係的探討，部份學者與研究者試圖延伸Bowen三角關係的概念，彙整或發展不同的三角關係運作模式與內涵。

Bell與Bell (1979) 首先嘗試將三角關係分成兩種類型，第一種是跨世代聯盟 (cross-generational coalition)，指當婚姻關係中的緊張程度升高時，夫妻中的一方藉由尋求小孩的支持與指責另一方的錯誤來避免面對婚姻問題。第二種是代罪羔羊 (scapegoating)，指當婚姻關係中的緊張升高時，夫妻藉由把注意力集中在小孩的問題上而避免直接面對兩人的衝突。

Guerin, Fay, Burden與Gilbertkautto (1987) 延伸Bowen的三角關係概念，並將小孩捲入父母婚姻衝突的情形分成三種形式，第一種，視小孩為慰藉者 (相當於固定的跨世代聯盟)，第二種，夫妻搶奪小孩與之聯盟 (相當於非固定的跨世代聯盟)，第三種，視小孩為問題對象 (相當於代罪羔羊)。

Kerr與Bowen (1988) 則將三角關係的運作分成下列三種類型：第一種，相當於上述的跨世代聯盟。第二種則是代罪羔羊的模式。第三種是親職化 (parentification)，指小孩非常積極地介入父母的爭吵與問題中。

Brotherton (1989) 延伸Bowen三角關係與家庭投射過程的概念，並綜和其他的研究結果將三角關係分成代罪羔羊與親職化兩種類型，發展出家庭三角關係量表 (Family Triangulation Scale, FTS)。Brotherton指出，代罪羔羊與親職化的功能都是減緩婚姻關係中的緊張與焦慮，而且被捲入的小孩也因為這樣的過程而得到權力，但是代罪羔羊與親職化也有不同之處。在代罪羔羊的形式中，夫妻仍是

承擔作為父母的責任與權威的人，但在親職化的形式中，小孩反而承擔起父母的責任。再者，在代罪羔羊的模式中，夫妻間維持最舒適距離的方式是把焦點放在小孩的身上；而在親職化的模式中，夫妻間維持最舒適距離的方式是把小孩放在與配偶齊高或高過配偶的位置。

除了Bowen之外，Minuchin (1974) 也曾提出三種不同的三角關係運作模式，包括：不穩定的強制聯盟 (unstable coercive coalition)，穩定的聯盟 (stable coalition) 與迂迴 (detouring)。其中迂迴又可分為支持性迂迴 (detouring-supportive) 與攻擊性迂迴 (detouring-attacking)，支持性迂迴是指父母聯合起來照顧較軟弱的或生病的小孩，攻擊性迂迴則是指父母聯合起來管教強勢的或有問題行為的小孩。由Minuchin對這三種三角關係運作模式的描述得知，不穩定的強制聯盟與穩定的聯盟相當於Bowen之非固定的，固定的跨世代聯盟，而迂迴則相當於代罪羔羊的概念。Richie (1986) 參考Minuchin對三角關係運作的分類，以不穩定的強制聯盟、穩定的聯盟、支持性迂迴與攻擊性迂迴等四個向度的三角關係，再加上階層性雙重束縛 (hierarchical double bind) 的概念，發展由青少年自填的三角關係量表。雖然因素分析的結果只支持其中的迂迴向度 (包括支持性與攻擊性迂迴)，但此研究證實三角關係是多向度的建構，以及三角關係在青少年行為問題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綜合上述的文獻得知，近期的研究傾向由多向度建構的角度，更精微地描述三角關係互動的內涵。再者，雖然上述研究者對三角關係內涵的探討不完全相同，但大致可歸納出代罪羔羊，跨世代聯盟與親職化等三種模式。而目前國內缺乏直接探討三角關係的研究，本研究依據此三種三角關係的模式編製測量工具，並探討其與兒童行為問題之間的關連。

(二)三角關係之測量

在評估三角關係的研究工具上，早期主要是以使用會談法 (Tebyer, 1983) 與間接測量法 (Bell & Bell, 1979; Wilson & Rohraugh, 1985) 為主，而近期的趨勢則以發展直接測量的量表為主。接下來則針對這些直接測量的研究工具界定三角關係的內容，以及可能的限制——說明之：

Goglia曾以親職化的概念發展由大學生填寫的親職化量表 (The Parentification Scale) (引自Brotherton, 1989)。Richie (1986) 以Minuchin對三角關係的定義為基礎而發展出青少年三角關係量表 (Adolescent Triangulation Instrument，

ATI)，但該量表中僅有迂迴這個向度得到因素分析的支持；Brotherton（1989）以Bowen的三角關係概念所發展出來的家庭三角關係量表（FTS）雖然可以清楚地把三角關係界定為代罪羔羊與親職化兩個向度，但是由於研究者強調多重世代的觀念，因此量表中除了親子關係中的三角關係這個向度外，還包括早期與原生家庭的關係以及目前的婚姻關係等向度，親子關係中的三角關係題目很有限。Grych與Fincham（1990）由認知與壓力因應的角度所發展的兒童知覺雙親衝突量表（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CPIC）中的三角關係分量表是由兒童所填寫的唯一直接測量父母婚姻衝突中的三角互動情形，但該分量表內容僅包含跨世代聯盟單一的概念，而且題目非常有限（僅有四題）。

另外還有一些主要目的是測量自我分化的概念，但其中包含有三角關係分量表的測驗。Bray, Williamson與Malone（1984）所發展出來的由父母填寫的家庭系統中的個人主權量表（Personal Authority in the Family System Questionnaire, PAFS），以及國內賈紅鶯（民80），王嚮蕾（民83）根據PAFS的架構分別編製由兒童與青少年所填寫的「子女自我分化量表」與「青少年自我分化量表」等量表中皆有測量三角關係的分量表，但題數有限。雖然這些研究者並沒有再細分出三角關係的向度，但由分量表的內容來看，主要包含跨世代聯盟與代罪羔羊兩種概念。

此外，由何者填寫三角關係量表最能真確反應家庭情境中的三角關係也是一直有爭議的。大部份研究婚姻衝突的學者傾向由兒童的角度來評估，其原因除了強調個人主觀經驗的重要性之外，另一個考量點是由於兒童的父母本身就是婚姻衝突中的當事者，情緒因素很容易影響他們對衝突評估的客觀性，以及因為社會期許而產生評估時的主觀偏差，因此主張由兒童的角度來評估婚姻衝突（Grych, Seid & Fincham, 1992；江睿霞，民83）。本研究所發展的量表也是由兒童的角度進行測量，並且在量表中盡量以具體化的行為描述，以及簡單的用字來彌補兒童自填量表的缺點。

綜合上述的文獻探討可以得知，目前尚未有同時涵括跨世代聯盟、代罪羔羊與親職化三個類型的三角關係量表，因此，研究者根據Bowen（1978），Kerr與Bowen（1988），Brotherton（1989），賈紅鶯（民80），王嚮蕾（民83）與江睿霞（民83）等人的理論與量表，發展由兒童自填的三角關係量表。

(三)影響兒童涉入三角關係之因素

性別 在Bowen的家族系統理論中並未將性別的議題放入其建構的理論中，因此在後續有關三角關係的研究中也很少探討不同的性別在自我分化與涉入三角關係的差異情形。而在Gilligan（1982）的女性道德理論以及Jordan, Kaplan, Miller, Stiver&Surrey（1991）的關係中自我理論中，除了質疑以相同標準衡量不同性別個體心理健康的恰當性之外，並強調「關係」對女性行為抉擇與自我發展的重要性，且由過去探討人際關係或婚姻關係的研究得知，性別因素在如何看待衝突以及面對衝突的反應有其影響力（陳秉華，民85；Cummings, Vogel, Cummings & El-Sheikh, 1989; Miller, Danaher & Forbes, 1986）。因此，性別因素在兒童面對父母的婚姻衝突時，其與三角關係的運作情形是本研究想一窺究竟的。

出生序 Bowen認為在家庭系統中，每個小孩的實際出生序可能不等同於功能上的出生序，而且其功能上的出生序會比實際上的出生序更可以預測是否會被捲入父母的婚姻衝突，但他仍指出通常長子（女）以及老么最容易吸收父母的焦慮，而進入三角關係中。他指出長子（女）之所以最容易被捲入三角關係中，是因為他是第一個進入家庭情緒系統中的孩子，但有時，父母會跳過其他的小孩，而直接拉最小的孩子進入三角關係中，很可惜的，Bowen並沒有針對這個現象提出他的解釋。截至目前為止，並沒有用量化研究法直接探討不同出生序兒童在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之差異情形。本研究嘗試以Bowen對不同出生序兒童涉入三角關係的假設為基礎，並參考莊千慧（民83）的分類將出生序分為老大、中間子女、老么、獨生子女四個類別，探討不同出生序的兒童在涉入三角關係的差異情形。

二、兒童行為問題

(一)兒童行為問題

當兒童面對生活環境中的壓力時，一方面由於本身的問題解決能力有限，二方面由於兒童與青少年在認知與情緒上的發展尚未成熟，無法像大人一樣用口語的方式表達其情緒與壓力，因此當兒童面臨壓力或經歷情緒困擾時，最容易反應在行為問題上。因此，兒童所表現的行為問題可視為評估其壓力與適應的最佳指

標。

(二)兒童行為問題的測量

Achenbach於1978年所發展的「兒童行為檢核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是一份行之多年，有良好信效度的實徵取向診斷測驗工具，不僅適用於臨床上診斷兒童行為問題，更常被探討非臨床個案的兒童相關行為問題的研究者所使用(Emery, 1982; Fauber, Forehand, Thomas & Wierson, 1990; O'sbore & Fincham, 1996)。

兒童行為檢核表包括社會力量表與行為問題量表兩個部份。行為問題量表主要是測量兒童的不適應行為，而社會力量表則是評估兒童的正面適應能力。針對研究者的興趣，本研究中僅使用行為問題量表，並以「兒童行為檢核表」這個名稱代替兒童行為檢核表中的「行為問題量表」。

在兒童行為檢核表中，Achenbach不僅發展窄義定義的兒童問題行為之症狀量表，例如：憂鬱、社會退縮、過動、強迫症狀等量表，更發展廣義定義的兒童問題行為之內化與外化量表。所謂的內化問題，指的是與自我有關的問題，其表現的方式是害怕、不快樂、抱怨身體不舒服等現象。而外化問題，主要是指與他人的衝突有關的問題，其表現方式是攻擊行為、犯罪行為、過動行為、打架、破壞與不守規則。

由於這份量表是研究有關兒童行為問題時最常被使用的量表之一，其內容與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吻合，且量表的信效度頗佳，因此選為本研究探討兒童行為問題的研究工具。

三、三角關係與國小兒童適應行為之相關研究

(一)三角關係與適應行為之相關研究

在適應行為的部份，Arnold (1983)的研究指出，青少年自陳的代罪羔羊傾向愈明顯，其適應的問題也就愈多；Jenkins等人(1989)的研究結果指出，介入父母爭吵與兒童的困擾呈正相關，過度介入父母關係的兒童會比未介入者較易呈現行為症狀；賈紅鶯(民80)，王嚮蕾(民83)的研究結果也指出，涉入父母三角關係愈高的兒童或青少年，其適應較差且焦慮感高；不過，在Lungen (1994)以77位非臨床個案的青少年與其父母為受試所作的研究指出，無論在核心或繼親家庭中，跨世代聯盟的現象與青少年適應的相關皆未達顯著，也就是說跨世代聯

盟的變化與適應行為無關。

在情緒調節功能方面，Dwyer（1993）的研究指出，兒時的親職化程度愈高，成年後罹患恐慌疾患的可能性也就愈高；Martin（1996）以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的女性成人為受試，探討親職化的程度與內在心理問題以及人際問題的相關情形。結果顯示，情緒親職化的程度愈高，雖然有利於受試在人際關係的覺察與支持能力，但卻不利於受試處理人際衝突的能力；且當情緒親職化的程度愈高，出現憂鬱與焦慮的情形增加，自我的評價則下降。

在自我功能的部份，三角關係與自我功能的相關情形則呈現較不一致的現象。Bell與Bell（1979）以15到17歲的女孩及其父母為受試，了解三角關係（包括代罪羔羊與跨世代聯盟兩種概念）與自尊及自我控制的相關情形。結果顯示三角關係的情形愈顯著，自我功能與自我控制愈差。McKenna（1996）以249位大學生為受試者所做的研究指出，親職化的程度愈低，受試的自尊愈高。但Pola（1993）的研究指出，親職化的程度與兒童自尊沒有關連；Pate（1986）的研究也指出，跨世代聯盟與代罪羔羊皆無法預測大學生的自我功能，也就是說，無法由跨世代聯盟與代罪羔羊的程度估計大學生的自我功能。

在親密關係方面，Erikson（1963）的發展理論指出親密關係是青年期的主要發展任務，因此在探討三角關係對親密關係的影響研究中皆以大學生或成人為受試者。雖然先前的研究皆非以兒童為研究對象，但仍可由這些研究中了解三角關係對兒童的長期影響。West, Zarski與Harrill（1986）以66位大學生為受試，結果顯示與父母形成跨世代聯盟者比非跨世代聯盟者面臨較多的親密關係問題。London（1990）以大學生為受試的研究指出，不同家庭結構（完整家庭與離婚家庭）下的受試，在親密關係困難上的差異並未達到顯著水準，而親職化的程度才是影響親密關係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親職化程度比家庭結構更能預測受試的親密關係困難。

從以上的文獻探討得知，雖然有些研究的結果不太一致，但仍可發現三角關係與國小兒童的適應是有關連的，也就是說涉入三角關係的程度愈高，兒童的適應功能就愈差。此外，上述的研究幾乎都是在美國進行的，其研究結果是否可以推論到國內的狀況尚有待觀察，本研究將針對國小五、六年級兒童進行實證研究，以了解台灣兒童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與其行為問題之間的關連。

(二)三角關係影響兒童適應行為的心理歷程

由於三角關係中的跨世代聯盟、代罪羔羊與親職化對行為問題的影響機制並不完全相同，因此以下將依序探討這三個向度對行為問題的影響過程。

跨世代聯盟 陷入跨世代聯盟的小孩要面對的最大難題是忠誠 (loyalty) 的問題。在尚未穩定的跨世代聯盟中，由於父母雙方都想拉攏孩子站在自己這一邊，而使得夾在中間的小孩陷入一個兩難的危機，由於兒童無法處理這些背叛的情緒，而很可能導致行為違常 (Peterson & Zill, 1986)；而在穩定的聯盟關係中，小孩除了要面對忠誠的問題之外，由於長期缺乏對另一方父母的認同與相處，也會影響小孩的發展 (Kirshner, 1992)。而對於與兒童形成聯盟關係的父母中之一方來說，為了能繼續維持與小孩的關係，而不必去面對夫妻的問題，因此必須對小孩實施更多的控制。對於重視同儕關係勝過家庭關係，以及要發展獨立自主能力的前青春期的兒童來說，這些心理控制對他們在心理社會能力的影響是很可觀的。

代罪羔羊 代罪羔羊的小孩除了承擔來自父母的指責、要求與過度關心之外，父母間管教方式的不一致也是另一個壓力源。Vogel與Bell (1968) 曾指出父母引導子女成為代罪羔羊的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父母在外顯 (overt) 與內隱 (covert) 管教內涵上的不一致。例如：父母雖然有時會斥責或處罰小孩的不良行為，但有時卻又漠視這些行為或延宕處罰；第二種方式，父母間管教的不一致。例如：父親斥責小孩亂丟玩具的同時也間接地斥責母親對這些行為的允許。長期處在這些心理拉鋸下的小孩很難不內化這些父母的衝突，而一旦他遵循父母對他不良行為的期待後，父母也就開始把他當作問題小孩了。Brotherton (1989) 曾整理出反應在親子次系統中的代罪羔羊現象，主要有下列的表徵：1. 父母一方或雙方擔任迫害的角色。2. 雖然父母對如何教養小孩的意見不一致，但不會直接討論或解決。3. 父母只有在兒童出現無法接受的行為時才會告知小孩規則。4. 雖然配偶不見得贊同對方對小孩的嚴厲管教，但管教小孩成了夫妻之間維持最舒適距離的方式。5. 父母有時會覺得他們對小孩的管教太嚴了，但有時又覺得自己只是做到最起碼的要求而已。6. 父母自覺在管教代罪羔羊小孩上很失敗。

親職化 在目前的台灣社會中，由於傳統孝道以及家族觀念的影響，孩子在家中承擔家事，照顧兄弟姊妹等行為是被父母、師長、社會大眾所讚賞的，而且是做的愈多愈表示孝順，但反觀歐美，特別是美國有關家族治療與研究的學者卻

有不同的想法。美國的家族治療理論與研究學者認為，親職化包含有正向以及負向的影響。在正向影響的部份，主要是探討親職化與人際關係技巧的相關 (Martin, 1996)，以及親職化與選擇助人專業的關連性 (Gracer, 1993)；在負面影響的部份，主要是探討親職化經驗對不同年齡層受試，在個人心理功能以及情緒調節能力上的相關 (London, 1990; Martin, 1996)。而本研究關注的焦點是在負面影響的部份。

Boszormenyi-Nagy指出當父母對子女有過多的要求或誇大孩子要負擔的責任時，很容易形成孩子對父母的隱形忠實 (invisible loyalty)，使得孩子覺得自己虧欠父母許多，除非他把父母的需要擺在自己的需要之前，否則無法擺脫不忠實與罪惡的感覺 (引自 Goldenberg & Goldenberg, 1996)。Boszormenyi-Nagy與 Spark由發展的角度指出，與父母形成過度的情緒連結或承諾，會使得子女更不容易完成與原生家庭的心理分離 (引自 Teyber, 1983)。Held與Bellow (1983)指出父母與小孩角色的互換是造成青少年自殺行為與危機反應的重要因子，而青少年的自殺行為可視為他承擔父母角色的沈重負擔以及逃避這個角色的企圖。

根據上述的文獻探討，研究者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 1.不同性別的兒童在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 (跨世代聯盟，代罪羔羊與親職化) 以及行為問題上有顯著差異。
- 2.不同出生序的兒童在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 (跨世代聯盟，代罪羔羊與親職化) 以及行為問題上有顯著差異。
- 3.兒童在「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量表」之跨世代聯盟、代罪羔羊與親職化三個分量表的得分，與「兒童行為檢核表」的內化行為問題、外化行為問題與全行為問題三個分量表得分之間會有顯著正相關。
- 4.兒童在「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量表」之跨世代聯盟、代罪羔羊與親職化三個分量表的得分，能有效預測他在「兒童行為檢核表」的內化行為問題、外化行為問題與全行為問題三個分量表的得分。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在研究有關婚姻衝突或父母爭吵對兒童行為問題的影響之研究中，主要是以青少年前期的兒童（十一至十四歲）為研究對象，其原因不僅來自於穩定的家庭關係對青少年前期的學童特別的重要，而且當他們再大一點時，他們不只會面臨婚姻衝突，也可能涉入其他的衝突中，而使得衝突來源變得複雜（Csikszentmihalyi & Larson, 1984; Fauber, Forehand, Thomas & Wierson, 1990）。

本研究是以台灣中部地區（包括台中縣、台中市、彰化縣、彰化市）國小五、六年級來自完整家庭的學生為研究母群體。研究者採方便取樣抽樣八所學校，每所學校選取五、六年級各一班，進行問卷施測。扣除來自非完整家庭以及作答不完整的問卷後，最後得有效樣本526份。樣本的出生序與性別分布情形如下：老大共有201人，其中男117人，女84人；中間出生序有123人，男50人，女73人；老么189人，男118人，女71人；獨生子女共有13人，其中男5人，女8人。

在抽樣的526位學生中，有4.2%的學生出現有明顯的內化行為問題，有6.7%的學生出現有明顯的外化行為問題，由這些數據可以得知，本樣本代表行為問題較少的非臨床個案人口群。在社經地位的部份，本研究依照Hollingshead的分類方式，採用父母的教育程度與職業作為指標，並將之分類成五種社經地位。在研究樣本中，有57位家長因作答不完全，而無法歸類其社經地位。在469個家庭中，4.1%屬於第一階層，8.3%屬於第二階層，32.4%屬於第三階層，41.4%屬於第四階層，13.9%屬於第五階層，由此可看出本樣本代表一般中低社經地位的人口群。

二、研究工具

(一)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量表

研究者依據Bowen家庭系統理論中的三角關係概念，並參考相關文獻與量表，發展由兒童所填寫的「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量表」，用以測量國小五、六年級兒童涉入三角關係的程度，茲描述量表編製的過程如下：

1. 編製量表預試卷。

在閱讀以及整理相關文獻後，研究者依據Bowen家庭系統理論中的三角關係概念，並參考Richie（1986）所發展的青少年三角關係量表，Brotherton（1989）編製的家庭三角關係量表，賈紅鶯（民80）所編製的「子女自我分化量表」中的涉入核心三角關係分量表，王嚮蕾（民83）所編製的「青少年自我分化量表」中的代間三角關係分量表，江睿霞（民83）所修訂的「兒童知覺雙親衝突量表」中的三角關係分量表，以及統整研究者在醫院體系的兒童與青少年門診中接觸有關婚姻衝突對小孩影響的經驗，針對代罪羔羊，跨世代聯盟與親職化三個向度，初步擬定描述有關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問句，共126題。之後，研究者邀請專精家族治療理論並有豐富治療經驗的學者，國小輔導老師與高年級導師，以及國小六年級的學生（不同成績水準）針對預試量表題目進行鑑別題意以及語意難易度的評估，最後決定預試問卷105題，採Likert三點量尺計分方式。

2. 預試、選題與因素命名。

預試量表確定後，以彰化縣市國小五、六年級共231位學生進行預試，刪除作答不全以及非來自完整家庭的問卷後，最後以207份問卷作為項目與因素分析的樣本。

在項目分析的部份，先以每題與全量表總分的相關未達到0.25或未達顯著，以及臨界比（critical ration，CR值）在3.0以下兩項標準作為刪題的依據後，得內部一致性頗佳的91題。在決定因素數目的部份，本研究採用主成份分析法抽取三個因素，並以正交軸旋轉法中的最大變異數法形成因素結構。

在刪選題目的部份，本研究以題目在各因素之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大於0.35，且同時在其他因素的因素負荷量小於0.25兩項準則，做為選取題目的標準，得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量表48題。在因素命名的部份，研究者依據原量表的架構為三個因素命名如下：(1)因素一命名為「代罪羔羊」，共有20題，表示兒童成為家庭中代罪羔羊的程度。(2)因素二命名為「跨世代聯盟」，共有13題，表示兒童與父母形成聯盟關係的程度。(3)因素三命名為「親職化」，共有15題，表示兒童親職化的程度。三個因素可解釋27.2%的變異量。

3. 效度與信度。

在效度的部份，本研究以賈紅鶯（民80）所編製的「子女自我分化量表」中的「涉入核心三角關係」分量表，以及江睿霞（民83）所修訂的「兒童知覺雙親衝突量表」中的「三角關係」分量表為效標，與研究者自編的「父母爭吵時的三

角關係運作量表」中的代罪羔羊，以及跨世代聯盟兩個分量表，進行同時效度的考驗。結果顯示，相關係數介於0.29至0.51之間，且皆達到顯著水準，也就是說，代罪羔羊與跨世代聯盟兩個分量表，具有不錯的效標關連效度。在親職化分量表的效度部份，由於國內缺乏合適的親職化量表效標，因此，在本研究中，主要採用專家效度的方式，研判親職化分量表試題取樣的適切性，結果肯定分量表試題的取樣適當性。在信度的部份，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值為0.88，代罪羔羊、跨世代聯盟、親職化三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值分別為0.86、0.82、0.84，顯示量表的信度頗佳。

(二)兒童行為檢核表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

本量表是由黃惠玲（民82）翻譯Achenbach的兒童行為檢核表，再加入本土文化題目而成，之後由薛惠琪（民84）補充信、效度，以及建立不同年齡層的常模。

兒童行為檢核表是由兒童的父母或主要照顧者，依據最近六個月內兒童的行為表現來填答，採三點量表。量表共有144題，其中有24題是新增本土化的題目，量表中共包括有症狀量表、外化量表、內化量表與全行為量表等分量表。由於本研究以非臨床個案為研究對象，因此僅使用內化、外化與全行為三個量表的分數。

在信度的部份，六到十一歲男童，六到十一歲女童，十二到十六歲男童，十二到十六歲女童，在內化量表與外化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數值分別為0.91、0.95，0.91、0.94，0.92、0.93，0.91、0.94（薛惠琪，民84）。顯示本量表各題的一致性相當高，是頗具信度的研究工具。在效度的部份，黃惠玲（民82）採用因素分析法比較CBCL題目的文化差異，結果顯示台灣與美國的CBCL有相當一致的因素結構，是一份值得信任的研究工具。



一、不同性別兒童在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與行為問題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想了解男女童在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程度上是否有差異，因此

表一列出男女童在代罪羔羊、跨世代聯盟與親職化三個分量表上的平均數與標準差，並用t檢定以考驗男女童在這三個分量表上是否有差異。結果顯示除了在代罪羔羊這個向度上的差異有達到顯著差異水準之外，其餘的向度皆未達到顯著差異水準（ $t=2.82, p<.01$ ； $t=0.58, p>.05$ ； $t=-0.62, p>.05$ ）。男女童在父母爭吵下成為代罪羔羊的程度有顯著差異存在，且男童比女童成為代罪羔羊的程度來得高（ $M=30.35$ ； $M=28.72$ ），而在跨世代聯盟與親職化上則無性別上的差異。

為了解男女童在行為問題上的差異情形，首先以平均數及標準差呈現男女童在行為問題各向度的得分情形，並用t檢定以考驗男女童在內化、外化與全行為量表上的得分是否有差異，結果發現男女童在內化行為上的差異並未達顯著差異水準，而在外化、全行為兩個向度皆達到顯著差異水準（ $t=-1.25, p>.05$ ； $t=4.27, p<.001$ ； $t=2.03, p<.05$ ），且男童比女童出現有較高的外化行為與全行為（外化行為，男童， $M=55.04$ ，女童， $M=51.01$ ；全行為，男童， $M=60.66$ ；女童， $M=59.98$ ）。

表一

男女童在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及兒童行為檢核表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男童 (n=290)		女童 (n=236)		t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三角關係〉					
代罪羔羊	30.35	7.09	28.72	6.13	2.82**
跨世代聯盟	17.17	3.60	16.98	3.64	0.58
親職化	28.28	5.96	28.60	5.67	-0.62
〈行為問題〉					
內化行為	50.04	9.67	51.12	10.13	-1.25
外化行為	55.04	10.59	51.01	10.96	4.27***
全行為	60.66	3.72	59.98	3.93	2.03*

註：* $p<.05$ ** $p<.01$ *** $p<.001$

二、不同出生序兒童在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與行為問題之差異情形

為了探討不同出生序兒童在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向度上是否有差異存在，首先在表二列出不同出生序兒童在代罪羔羊、跨世代聯盟與親職化三個向度

表二
不同出生序兒童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及行為檢核表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出生序							
	老大 (n=201)		中間 (n=123)		老么 (n=189)		獨生子(女) (n=13)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三角關係〉								
代罪羔羊	29.92	6.82	30.11	6.76	29.58	6.35	30.54	9.91
跨世代聯盟	16.34	2.90	17.38	3.82	17.62	3.98	17.92	4.46
親職化	28.88	6.05	27.73	5.51	28.33	5.77	29.31	6.12
〈行為問題〉								
內化行為	50.80	9.36	51.30	10.75	49.51	9.85	53.69	9.17
外化行為	52.73	10.32	54.80	11.85	52.70	10.99	53.92	9.83
全行為	60.23	3.38	60.81	4.21	60.14	4.01	61.15	3.85

上的平均數與標準差，接著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考驗，結果顯示不同出生序兒童僅有在跨世代聯盟的差異達到顯著差異水準[F(3,522)=4.87, p<.01]。以Scheffe事後檢定來檢查不同出生序兒童在跨世代聯盟上的差異情形，結果顯示只有老么在跨世代聯盟上的情形顯著高於老大；而在代罪羔羊與親職化兩個向度上皆未達到顯著差異水準[F(3,522)=0.46, p>.05; F(3,522)=1.10, p>.05]。結果請見表三。

表三
不同出生序兒童在代罪羔羊、跨世代聯盟與親職化分量表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代罪羔羊〉				
組間	0.16	3	0.05	0.46
組內誤差	59.07	522	0.11	
總結	59.23	525		
〈跨世代聯盟〉				
組間	1.11	3	0.37	4.87**
組內誤差	39.53	522	0.08	
總結	40.64	525		
〈親職化〉				
組間	0.50	3	0.17	1.10
組內誤差	78.78	522	0.15	
總結	79.28	525		

註：**p<.01

為了解不同出生序兒童在行為問題上的差異情形，首先以平均數與標準差呈現現老大、中間、老么與獨生子（女）四組受試在行為問題上的得分情形，接著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考驗，結果顯示不同出生序的兒童在內化行為、外化行為與全行為上的差異皆未達到顯著差異水準 $[F(3,522)=1.41, p>.05; F(3,522)=1.16, p>.05; F(3,522)=1.05, p>.05]$ ，顯示不同出生序的兒童在內化、外化與全行為上的得分情形並無顯著差異存在。結果請見表四。

表四
不同出生序兒童在內、外化與全行為得分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內化行為〉				
組間	412.69	3	137.56	1.41
組內誤差	50886.49	522	97.48	
總結	51299.18	525		
〈外化行為〉				
組間	415.70	3	138.57	1.16
組內誤差	62336.00	522	119.42	
總結	62751.70	525		
〈全行為〉				
組間	45.98	3	15.33	1.05
組內誤差	7646.82	522	14.65	
總結	7692.80	525		

註：* $p<.05$ ** $p<.01$ *** $p<.001$

三、兒童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與行為問題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想要了解兒童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與其行為問題之關係，由於之前的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的兒童在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向度與行為問題上有顯著差異存在，因此將男女童分開來計算各變項之間的相關係數，結果請見表五。

在男童的部份，代罪羔羊與內化行為的相關未達顯著，而與外化行為、全行為的相關則達顯著（ $r=.05, p>.05; r=.12, p<.05; r=.10, p<.05$ ），跨世代聯盟與內化行為、外化行為與全行為的相關皆未達顯著水準（ $r=.07, p>.05; r=.05, p>.05; r=.09, p>.05$ ），親職化的程度與內化行為、外化行為與全行為呈負相關且皆達到顯著水準（ $r=-.13, p<.05; r=-.12, p<.05; r=-.12, p<.05$ ）。

表五
男女童在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與行為問題之相關係數表

	男生受試			女生受試		
	內化	外化	全行為	內化	外化	全行為
代罪羔羊	.05	.12*	.10*	.12*	.13*	.13*
跨世代聯盟	.07	.05	.09	-.02	.01	.02
親職化	-.13*	-.12*	-.12*	-.18**	-.20**	-.23***

註：*p<.05 **p<.01 ***p<.001

在女童的部份，代罪羔羊與內化行為、外化行為與全行為的相關皆達顯著（ $r=.12; p<.05; r=.13; p<.05; r=.13, p<.05$ ），跨世代聯盟與內化行為、外化行為與全行為的相關皆未達顯著水準（ $r=-.02, p>.05; r=.01, p>.05; r=.02, p>.05$ ），親職化的程度與內化行為、外化行為與全行為呈負相關且皆達到顯著水準（ $r=-.18, p<.01; r=-.20, p<.01; r=-.23, p<.001$ ）。

四、兒童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與其行為問題之迴歸分析

由之前的研究結果得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與兒童行為問題之間有關連，因此接著利用迴歸分析來考驗兒童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是否能有效預測兒童行為問題。先前的資料顯示，不同性別的兒童在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與其行為問題之間的相關係數並不相同，因此將男女童分開來進行迴歸分析。本研究以逐步多元迴歸的方式將三個自變項（代罪羔羊、跨世代聯盟、親職化）投入迴歸公式中，由電腦選取達顯著水準的變項，形成最後的迴歸方程式。表六為綜合的迴歸分析表。

在男童的部份，在「內化行為」的部份，被選入迴歸模式的僅有「親職化」這個變項，「親職化」可以解釋「內化行為」總變異量的1.57%。在「外化行為」的部份，被選入迴歸模式的有「親職化」與「代罪羔羊」兩個變項，共可以解釋「外化行為」總變異量的3.38%。在「全行為」的部份，被選入迴歸模式的有「親職化」及「代罪羔羊」兩個變項，這兩個變項總共可以解釋「全行為」總變異量的2.82%。

在女童的部份，在「內化行為」的部份，被選入迴歸模式的有「親職化」與「代罪羔羊」兩個變項，共可以解釋「內化行為」總變異量的5.12%。在「外化

表六
 男女童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對其行為問題預測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內化行爲〉	男			女			
	B	SE B	Beta	B	SE B	Beta	
1.親職化	-3.05	1.42	-0.13	1.親職化	-5.17	1.71	-0.19
				2.代罪羔羊	4.33	2.11	0.13
	$R^2=0.0157$			$R^2=0.0512$			
〈外化行爲〉	B	SE B	Beta	B	SE B	Beta	
1.親職化	-3.88	1.57	-0.15	1.親職化	-6.14	1.84	-0.21
2.代罪羔羊	4.14	1.76	0.14	2.代罪羔羊	5.06	2.27	0.14
	$R^2=0.0338$			$R^2=0.0609$			
〈全行爲〉	B	SE B	Beta	B	SE B	Beta	
1.親職化	-1.27	0.55	-0.14	1.親職化	-2.46	0.66	-0.24
2.代罪羔羊	1.30	0.62	0.12	2.代罪羔羊	1.82	0.81	-0.14
	$R^2=0.0282$			$R^2=0.0719$			

行爲」的部份，被選入迴歸模式的有「親職化」與「代罪羔羊」兩個變項，可以解釋「外化行爲」總變異量的6.09%。在「全行爲」的部份，被選入迴歸模式的有「親職化」與「代罪羔羊」兩個變項，兩者共可以解釋「全行爲」總變異量的7.19%。

討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不同性別兒童在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與行為問題之差異情形

在代罪羔羊的部份，結果顯示男童比女童容易成爲父母爭執下的代罪羔羊，這與江睿霞的研究（民83）男童比女童容易覺得自己與父母衝突有關，容易因爲父母的爭吵而自責的結果相吻合。其可能的原因是在小學階段中，大部分的男童都比女童出現有較多的調皮、不守規則、打架等外顯行爲問題，而顯著的行爲問題很容易成爲父母轉移夫妻間問題而相互指責的焦點。再者，在性別刻板化的印象中，男童是強壯，粗魯的，女童則是愛哭，脆弱的（Ruble & Martin, 1998），而使得父母可能較忍心將焦慮與怒氣發洩在男童身上。

在跨世代聯盟的部份，結果顯示男女童在跨世代聯盟的程度上並沒有差異。

這與江睿霞的研究（民83）男女童在三角關係（包括跨世代聯盟的概念）上並無差異的結果相符合。原因可能有下面幾個：1.在本研究中主要是比較所有受試者中的男女童在跨世代聯盟上的差異情形，而不是以個別家庭為單位，比較不同性別子女形成跨世代聯盟的差異情形。由於目前國人的生育率有逐年下降的傾向，有可能發生家庭中只有一個小孩，或有一個以上但都是同性別小孩的情形，因此性別因素對決定那個小孩容易形成跨世代聯盟的影響力也就下降了。2. Kerr與Bowen（1988）曾提出糾結的三角關係（interlocking triangle）概念也可以解釋男女童在跨世代聯盟上沒有差異的現象。由於三角關係只是夫妻逃避衝突的一種暫時性方法，因此，當衝突再次突顯或其中一個人的焦慮度又再次上升時，很可能藉由與其他人形成另一個三角關係的方式再次逃避衝突，到最後所有的家庭成員都可能糾結在三角關係中，因此性別對決定那個小孩最容易被捲入跨世代聯盟的影響力就不那麼重要了。

在親職化的部份，男女童在這個向度上的得分差異也未達到顯著水準，顯示男女童在親職化的程度上並沒有差異。研究結果與Cummings, Ballard, El-Sheikh與Lake（1991）的研究相符，即男女童在試圖解緩成人衝突的行為上並無差異。而Pola（1993）的研究也顯示男女童在親職化量表中的得分也未有差異。原因可能有下面幾個：Cummings等人（1991）以及Pola（1993）的研究，主要是以幼童與國小兒童為受試，但在以大學生或成年人為受試的研究，則發現女性的確會出現比男性更多的介入與照顧的行為（沈慶鴻，民86；陳秉華，民85），因此有可能這樣的連結關係在青春期或成年以後才會比較明顯。再者，本研究主要是比較所有男女童受試者在親職化程度上的差異情形，而不是比較個別的家庭中不同性別子女親職化程度的差異情形，因此子女的人數（例如：只有一個小孩）與子女的性別（例如：都是女孩或男孩）可能會影響兒童被親職化的機會，而無法單由性別因素來決定親職化的人選。

比較不同性別的兒童在行為問題上的差異，結果顯示男童出現外化行為與全行為的情形比女童來得高，而在內化行為上的表現則無顯著差異。研究結果與Maccoby與Jacklin的研究一致，即男性比女性更富攻擊性（引自Ruble與Martin, 1998）。也與林明慧（民79）男童比女童出現有較高的攻擊行為的研究結果相吻合。從生物性的角度而言，男性因男性荷爾蒙分泌較多的關係，所以比女性表現出更多的攻擊行為。再者，男性比女性更富攻擊性的原因，可能是源於男女童在

教養以及社會化過程中的性別差異所造成的。在大部分的社會中，男童比較被允許用外顯或肢體的方式來發洩其內在的壓力，女童則由於被鼓勵要表現溫和與順從，多半只能壓抑自己的情緒，因此男童比女童容易出現攻擊行為。

(二)不同出生序兒童在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與行為問題之差異情形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出生序的兒童僅有在跨世代聯盟上的差異達到顯著水準，且在事後考驗中發現只有老么在跨世代聯盟上的情形顯著高於老大。本研究結果與Kerr與Bowen（1988）所提出的論點，也就是老大與老么會比其他出生序的兒童夠容易涉入父母爭執下的三角關係不太相同。這可能是由於老么是家中年紀最小的孩子，對父母的依賴程度最高，父母也很容易覺得需要特別照顧他，使得老么成爲自我分化最低的小孩，而老大由於年紀較長，能力較好，因此相較於家中更年幼的弟妹，其自我分化的程度則相對地較佳。此外，研究結果指出中間子女與其他出生序子女在跨世代聯盟上的程度並沒有差異。在Adler（1958）的「家庭星座」概念中指出雖然家庭對每個小孩都有一些共同的影響，但每個小孩的心理狀態會因爲出生排行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對次子或其他排行居中的小孩來說，他們自出生起就得和兄姊分享雙親的關懷與照顧，而比他們晚出生的老么又常常是家中最得寵的孩子，所以中間子女在家庭中常有不被重視的感覺，除了自怨自艾之外，向外發展（例如：學業表現、人際關係等）也是常見的因應方式。所以對中間子女來說，可能由於他們常置身於家庭之外，因此反而比老大或老么不容易被捲入父母的三角關係中。另外，在本研究中，獨生子女與其他出生序子女在跨世代聯盟上的程度也沒有差異，這與Adler（1958）認爲獨生子女通常會受到母親的溺愛，也會相當依賴母親的看法不太相同。其原因可能來自，在本研究中，雖然獨生子女在跨世代聯盟上的平均數是所有出生序兒童中最高的，但由於獨生子女的樣本數只有13個人，數值間的變異性較大，也容易受極端分數的影響，因此影響在事後考驗中的統計結果。

在比較不同出生序的兒童在行為問題上的差異情形，結果顯示不同出生序的兒童在行為問題上的表現並沒有差異。研究結果並不支持假設二，但與莊千慧（民83）的研究結果相吻合。這可能是因爲在台灣社會中，由於子女數減少以及兒童教育的重視，因此爲人父母者在管教子女上的品質比過去來得好，也比較不會有個別差異的情形，因此不同出生序兒童的適應行為之差別也就不明顯。

(三)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與兒童行為問題之相關情形

在——進行代罪羔羊，跨世代聯盟與親職化三種三角關係類型與兒童行為問題相關結果的討論之前，首先就樣本的特性進行探討。由受試在三角關係與行為問題的得分平均數與變異數（見表一）發現，本研究的受試主要以父母關係以及適應情形還不錯的兒童為主。由三角關係與行為問題相關值不高的結果得知，就這群樣本而言，即使偶而出現代罪羔羊，跨世代聯盟與親職化等現象，兒童仍然可以感受到父母的關心與照顧，三角關係的運作對兒童行為問題影響的程度有限。再者，Bowen的理論主要是針對精神分裂症家庭發展而成的，與本研究以非臨床個案家庭為主的情況不同。研究者認為，Bowen的理論可能無法完全適用於非臨床個案，因此當我們運用Bowen的理論在解釋一般家庭中的互動情形時，需要特別的謹慎。

在兒童涉入父母爭吵時三角關係的三種情況中，代罪羔羊與親職化分別與兒童行為問題呈顯著正相關與負相關，跨世代聯盟與兒童行為問題之間則未達到顯著相關。研究結果與研究假設三只有部份吻合。雖然男女童在這兩個變項上的相關係數值稍有差異，且女童之涉入三角關係與行為問題的相關值幾乎普遍高於男童，但其趨勢仍大致相同，因此底下不再細分男女童各自的相關情形，而予以一併討論之。

在「代罪羔羊」這個向度上與兒童行為問題之間的相關達顯著，符合Bowen理論中所指出的陷入三角關係中的兒童其心理健康會受到不良影響的概念。研究結果與Arnold（1983）的研究結果一致，即青少年自陳的代罪羔羊傾向愈明顯，其適應問題也就愈多。賈紅鶯（民80）的研究結果亦指出，兒童涉入核心三角關係的程度愈低，其適應水準愈高。本研究結果顯示，對兒童或青少年而言，當父母把夫妻關係中的緊張發洩在孩子身上，或過分專注於管教孩子的問題來轉移夫妻的衝突時，對兒童的適應情形也就愈不利。

「親職化」與兒童行為問題呈負相關，這與大部分的研究結果並不相同（Held & Bellow, 1983; Martin, 1996; Richie, 1986），原因可能有下列幾個：1.文化因素。如之前文獻探討所述，兒童親職化是台灣社會中所稱許的，兒童藉由承擔責任而獲得家中的地位與家長的讚許，因此反而不容易出現問題行為。2.年齡因素。在歸納親職化的相關研究中可發現不同年齡層的受試者其結果不大相同，Pola（1993）以國小四、五年級的學生為受試者，探討親職化與學業表現之間的關係，結果其相關並未達顯著。而Held與Bellow（1983）、Richie（1986）以青少

年為受試者的研究結果分別指出親職化是影響青少年自殺行為與行為問題的重要因子。Martin (1996) 以成年女性為受試者所作的研究結果指出，親職化與受試者的憂鬱、焦慮有正相關。由這些結果來看，對親職化的兒童來說，雖然其親職化的行為可以得到來自父母與師長的讚美與注意，而使得其適應行為更良好，但隨著親職化壓力的增加，影響的範圍愈廣，雖然有助於其人際關係，但情緒上的負荷可能是造成他們長大後適應不良或尋求專業幫助的原因。而本研究只針對十一、二歲的兒童進行探討，或許受試長大後，在情緒與行為問題方面，會有不同的表現。

3. 「社會期許」的影響。在親職化分量表中的部份題目可能與傳統的孝道與兄長要照顧弟妹的概念有些類似，使得兒童可能因為「社會期許」而影響其作答，而有高估親職化的可能，混淆了統計結果。

「跨世代聯盟」與兒童行為問題的相關未達顯著，這與主要以青少年或大學生為受試者所作的研究結果不太符合 (Bell & Bell, 1979; Lungen, 1994)，其可能原因來自：第一，Bowen認為只有在三角關係互動模式僵化與人選固定的情況下，三角關係才是有害的。而在本研究中，因為沒有去測量親子聯盟是屬固定或彈性交換，若屬後者，則可能是造成本研究結果在此部份未達顯著之因。第二，對位在青春前期期的國小五、六年級兒童而言，他們雖然已經開始發展獨立與自我意識，但還未非常明顯，因此與父母某一方聯盟雖然會有很多情感上的限制，但相對地也可能得到同盟一方很多的關愛，因此不至於出現太多的問題。第三，由正式樣本在跨世代聯盟上的得分情形來看，有很大比例的兒童在這個向度上的得分很低，除了考慮這群樣本的確很少經歷跨世代聯盟的現象之外，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跨世代聯盟分量表的敏感度不夠。在本研究中由於考慮兒童的認知功能尚未發展成熟，因此試圖由測量父母與兒童三人間的互動行為，以及由兒童主觀對父母的喜好或對爭吵原因的解釋來推測跨世代聯盟的現象是否存在。但對於跨世代聯盟中的忠誠問題以及三人之間微妙的互動規則等現象之測量較有限，因此可能無法完整地呈現跨世代聯盟的面貌。

四、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對兒童行為問題之預測情形

主要的研究發現可歸納成下列兩點：

第一，對男女童而言，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對兒童行為問題的解釋變異量皆有限，而在選入迴歸方程式的變項中，「親職化」皆是第一個被選入迴歸方程式的變項，且 β 值為負值，而除了在男童內化行為的預測部份之外，「代罪

羔羊」皆是第二個進入迴歸方程式的變項，其 β 值為正值，而「跨世代聯盟」皆未被選入迴歸方程式中。

儘管本研究結果可以部份支持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與兒童行為問題之間關連性的假設，然而其可解釋的變異量僅在2%到7%之間。解釋變異量不高的原因可能有下列幾個：如在相關結果的討論中所述，Bowen的理論主要適用於臨床個案家庭，而本研究是以非臨床個案為受試，在情緒糾結與互動模式上皆不若前者強烈與僵化，因此在三角關係與兒童行為問題間的關連性與預測力則有限。再者，我們可能低估適應良好的兒童在三角關係中的主體性與調適力。此外，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家長在作答兒童行為檢核表時，受「社會期許」的影響而有低估其小孩行為問題的傾向，因而影響解釋變異量。

在本研究中，親職化與代罪羔羊皆被選入預測兒童行為問題之迴歸方程式中，但兩者的預測方向不同，前者的 β 值為負值，顯示愈親職化的小孩其行為問題的發生率也就愈低，後者的 β 值為正值，顯示代罪羔羊的程度愈高，其行為問題的嚴重度也就愈高。除了預測方向的不同之外，親職化對兒童行為問題的預測力也都比代罪羔羊對行為問題的預測力來得高。針對這兩個差異，其可能原因有下面兩個：1.由功能的觀點來看。Brotherton（1989）指出當父母用代罪羔羊的方式來減緩夫妻間的衝突時，為了可以共同管教小孩，即使小孩本身的功能與行為表現尚可，父母仍會花很多的時間與精力來證實這個小孩是功能不良的，需要父母的幫忙；而當父母用親職化的方式來減緩夫妻間的緊張關係時，即使小孩尚未成熟到可以承擔家人的情緒需求，父母仍會找很多的線索來支持這個小孩是有能力的。長期內化這些期待與要求的代罪羔羊小孩會很配合地表現更差的功能與更多的行為問題，而親職化的小孩則努力表現得更好，成為受人稱讚的小孩。2.由發展與適應的角度來看。在Erikson（1963）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中指出，國小五、六年級階段的兒童所要面對的是勤勉（industry）與自卑（inferiority）的發展任務。對一個親職化的小孩來說，功能發揮有可能幫助他建立起對自己的自信，同時由於其負責與照顧他人需求的特質也讓他比較容易與同儕維持和諧的人際關係，而使得他的適應良好。而對代罪羔羊的小孩來說，功能不良與行為問題不僅會影響他的自信心，同時也容易被同儕團體孤立，而使其適應情形更惡化。

第二，女童在涉入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對兒童行為問題上的預測上，其可解釋的變異量皆比男童來得高，也意味著家庭因素對女童適應的影響比對男童的

影響來得大。這樣的研究結果與Jordan等人（1991）的關係中自我理論之概念相吻合，它指出不同於男性在發展個體化的過程中強調分離與自主的重要性，女性是在與他人連結的關係中發展自我，因此關係品質對女性的影響很大。透過本研究可發現影響男女發展上的差異在國小高年級階段就已見端倪。

(五)研究限制

在研究對象的部份，由於本研究的樣本群主要是以中、低社經地位家庭中的兒童為主，研究結果不宜推論到高社經地位家庭中的兒童。另外，本研究的樣本主要以老大，中間子女與老么為主，獨生子女人數有限，因此在解釋獨生子女涉入三角關係的現象，以及比較不同出生序兒童涉入三角關係的差異上有代表性不夠的困難，在解釋上需要更加小心。研究工具的部份，在研究者自編的「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量表」中，由於考慮兒童的認知功能尚未成熟，因此主要是由互動行為的角度來發展三角關係量表。可是，由於三角關係的運作非常複雜，因此仍難以涵括整個三角關係的全貌，特別是在跨世代聯盟分量表的部份。另外，在親職化分量表中，由於部份題目與孝道以及兄長友愛弟妹的概念相似，因此兒童可能因為社會期許的影響，而有高估親職化的可能。此外，在「兒童行為檢核表」的部份，由於本量表的使用對象包括臨床個案與一般個案，因此一般家長會認為部份題目中所描述的行爲是較奇怪的、怪誕的，而造成受試者家長的防衛與抗拒的心態。再者，由於量表的題數很多，雖然研究者試圖增加家長對研究的參與感與填寫量表的動機，但仍無法排除家長不認真作答的可能性，因而增加問卷可信度的變異性。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採相關研究，僅能驗證三角關係與兒童行為問題之關連性，不宜做因果推論。

二、建議

(一)對家長、輔導與諮商人員之建議

1.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完整家庭中，兒童成為父母爭吵下的代罪羔羊的確與行為問題有相關。因此建議學校與機構的輔導與專業人員，必須特別注意失功能家庭中代罪羔羊兒童的適應情形。再者，Bowen認為代罪羔羊兒童是因為吸納家庭系統的緊張，而代替整個家庭生病，因此，治療代罪羔羊兒童的首務是治療整個家庭系統，增加家庭成員的自我分化程度，以及減少成員間過度的情緒糾結。只有在代罪羔羊兒童不需要利用出現行為問題的方式來維持整個家庭的和諧時，

其行為問題才可能消失。

2.本研究發現，男童的確比女童容易成為父母爭吵時的代罪羔羊，以及老么比老大容易成為跨世代聯盟的人選。建議家長留心男童與老么在涉入三角關係上的脆弱性，避免與他們形成過度的情緒糾結，而影響兒童自我分化的發展。

3.本研究發現，國小五、六年級兒童的親職化程度與行為問題呈負相關。對父母關係和諧或兒童適應良好的家庭而言，親職化兒童由於功能發揮以及可以得到很多的讚許，而有助於適應，因此親職化兒童的家長不需要因此而有過度的自責。但親職化的長期影響則未可知，因此就兒童長期的心理適應而言，讓兒童安心做小孩而非大人仍是較佳的家庭運作方式。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1.研究工具的部份。

在研究者自編的「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量表」的部份，雖然經由信、效度的考驗，證明其在測量概念上的一致性與真確性，但由於量表的因素解釋變異量與因素結構穩定度不是非常理想，以及缺少親職化分量表的效標關連效度，因此，後續研究者或可進一步予以驗證。此外，三角關係的運作不只發生在兒童的身上，建議後續的研究者除了可以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受試者進行本量表的信、效度考驗之外，也可以在發展由青少年或成年人填寫的三角關係量表中，嘗試加入較抽象的互動行為或三人間情緒糾結的測量，以涵括更完整的三角關係互動內涵。

2.在研究變項的部份。

在探討家中那個小孩最容易成為三角關係下的犧牲者這個問題上，由於相關的研究很有限，且受限於研究者的時間與能力，本研究僅嘗試由性別與出生序兩個向度上來進行探討。由於影響家中那個小孩最容易形成與父母的三角關係之因素非常複雜，可能的影響因素不只包括孩子的性別與出生序，功能出生序、孩子的氣質、父母原生家庭的經驗（Kerr & Bowen, 1988）等都是可能的影響變項，因此建議後續的研究者可嘗試由上述向度探討家中那個小孩是最容易成為父母三角關係的人選。

3.研究方向。

本研究是國內首先嘗試由親職化的角度來探討兒童行為問題的研究，並嘗試將親職化界定為三角關係的模式之一。鑑於國內缺少親職化的相關研究以及本研

究結果與國外的研究結果不一致等原因，因此更需要後續的研究者繼續探討台灣社會中的親職化現象，以及比較在不同文化中親職化對兒童適應行為之影響差異。建議後續的研究者可以嘗試修訂國外Goglia（引自Brotherton, 1989）與Pola（1993）所編製的親職化量表，或自行編製更符合國情的親職化量表，以作為探討親職化相關研究的研究工具。

（三）結語

本研究試圖由父母與子（女）三人互動的角度來探討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對國小高年級兒童行為問題之影響。綜合而論，本研究的主要貢獻可歸納為下列兩點：1.彙整國內外有關「三角關係」的定義與測量方式，發展由兒童填寫的「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量表」，可作為後繼研究者在探討相關主題時的參考。2.部份驗證Bowen之三角關係對兒童心理健康的假設。其中代罪羔羊的程度愈高，兒童行為問題的程度也愈高；跨世代聯盟的變化與兒童行為問題無關；親職化的程度愈高，兒童出現行為問題的程度反而減少。並進一步討論在不同文化中親職化對兒童適應行為之影響差異，以及親職化對不同年齡層受試者之影響差異。



參考文獻

- 王嚮蕾（民83）原生家庭父母自我分化與青少年自我分化、焦慮之相關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江睿霞（民83）父母婚姻衝突對兒童生活適應之影響。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呂翠夏（民82）婚姻衝突對幼兒社會情緒發展之影響。台南師院學報，26，255-275。
- 沈慶鴻（民86）婚姻暴力代間傳遞之分析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博士論文。
- 林明慧（民79）家庭因素與學齡兒童攻擊行為關係之研究-以台北市國小學童為例。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 莊千慧（民83）出生序與父母管教態度對兒童的社會興趣及人格適應之影響。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秉華（民85）心理諮商中分離一個體化衝突改變歷程研究(二)。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NSC-84-2413-H003-016）。
- 黃惠玲（民82）發展台灣地區的多軸兒童行為衡鑑評量表。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結果報告。
- 賈紅鶯（民80）父母自我分化與子女自我分化與子女適應水準之相關研究：Bowen家庭系統理論之驗證。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薛惠琪（民84）兒童行為問題實徵性多軸衡鑑與分類之相關研究。私立中原大學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Achenbach, T. M. (1978). The child behavior profile: Boys aged 6-11.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6 (3), 478-488.
- Adler, A. (1958). 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 New York: Capricorn.
- Arnold, J. D. (1983). Family scapegoating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B 44 (05), p. 1614. (University Microfilms No. AAC8320637)
- Bell, L. G., & Bell, D. C. (1979). Triangulation: Pitfall for the Development Child.

-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psychodrama and sociometry, 32, 150-155.
- Bowen, M. (1978). Family therapy in clinical practice. Northvale, NJ: Jason Aronson.
- Bray, J. H., Williamson, D. S., & Malone, P. E. (1984). Personal authority in the family system: Development of a questionnaire to measure personal authority in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process.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10, 167-178.
- Brotherton, W. D. (1989). The Assessment of Parental Triangulation of Child.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 Csikszentmihalyi, M., & Larson, R. (1984). Being Adolescent: conflict and growth in the teenage years. New York: Basic Books.
- Cummings, E. M., Ballard, M., El-Sheikh, M., & Lake, M. (1991). Resolution and children's responses to interadult anger.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7 (3), 462-470.
- Cummings, E. M., Vogel, D., Cummings, J. S., & El-Sheikh, M. (1989). Children's responses to different forms of expression of anger between adults. Child Development, 60, 1392-1404.
- Davies, P. T., & Cummings, E. M. (1994).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 adjustment: An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6 (3), 387-411.
- Dwyer, T. J. (1993). The relationship of childhood parentification and adult panic disorder (agoraphobia).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B 53 (10), p. 5443. (University Microfilms No. AAC 9235345).
- Emery, R. E. (1982).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the children of disorder and divor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2, 2, 310-330.
- Erel, O., & Burman, B. (1995). Interrelatedness of marital relation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1 (1), 108-132.
- Erikson, E. H. (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Norton.
- Fauber, R., Forehand, R., Thomas, A. M., & Wierson, M. (1990). A mediational model of the impact of marital conflict on adolescent adjustment in intact and divorced families: The role of disrupted parenting. Child Development, 61, 1112-1123.

-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enberg, I., & Goldenberg, H. (1996). Family Therapy: An overview (4th ed.). New York: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 Gracer, A. D. (1993). Parentification, narcissistic vulnerability, empathy, and the choice of a helping profession.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B 53 (09), p. 4994. (University Microfilms No. AAC9300123).
- Grych, J. H., & Fincham, F. D. (1990).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A cognitive-contextual framewor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 (2), 267-290.
- Grych, J. H., Seid, M., & Fincham, F. D. (1992). Assessing marital conflict from the child's perspective: The 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Child Development, 63, 558-572.
- Guerin, P. H., Fay, L. F., Burden, S. L., & Gilbertkautto, J. (1987). The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of marital conflict: A four-stage approach. New York: Basic Books Publishers.
- Held, B. S., & Bellow, D. C. (1983). A family systems approach to crisis reactions in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9 (4), 365-373.
- Jenkins, J. M., Smith, M. A., & Graham, P.J. (1989). Coping with parental quarrel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28 (2), 182-189.
- Jenkins, J. M., & Smith, M. A. (1991). Marital disharmony and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s: Aspects of a poor marriage that affect children adversely.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32 (5), 793-810.
- Jordan, J. V., Kaplan, A. G., Miller, J. B., Stiver, I., & Surrey, J. L. (1991). Women's growth in connection: Writing from stone center. New York: The Guildford Press.
- Kerr, M. E., & Bowen, M. (1988). Family Evaluation. N.Y.: Norton & Company.
- Kirshner, L. A. (1992). The absence of the fath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40 (4), 1117-1138.
- London, J. A. (1990). Parental marital status and parentification: A study of childhood

- family environment and intimacy in young adulthood.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B 50 (10), p. 4776. (University Microfilms No. AAC8923509)
- Lungen, B. (199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ception of cross-generational coalitions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in stepfamilies compared to nuclear families.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B 54 (8), p. 4397. (University Microfilms No. AAC 9401955)
- Martin, M. T. (1996).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 in divorced families: Parentification and internalizing and relationship problems. Dissertational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B 56 (9), p. 5176. (University Microfilms No. AAC 9600428)
- McKenna, Z. (1996). A causal model of family influence: The effects of family structure, birth order, family satisfaction, and parentification. Dissertational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B 56 (11), p. 6466. (University Microfilms No. AAC 9608001)
- Miller, P. M., Danaher, D. C., & Forbes, D. (1986). Sex-related strategies for coping with interpersonal conflict in children aged five and sev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2 (4), 543-548.
- Minuchin, S. (1974). Family and Family Therap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sborne, L. N., & Fincham, F. D. (1996). Marital conflic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child adjustment: Does gender matter? Journal of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42 (1), 48-75.
- Pate, J. L. (1986). Aspects of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of parents associated with ego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offspring (identity, conflict, coalitions, scapegoating, family environment). Dissertational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A 47 (4), p. 1254. (University Microfilms No. AAC 8605196)
- Peterson, J. L., & Zill, N. (1986). Marital Disrupti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Behavior Problem in Childr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8, 295-307.
- Pola, L. E. (1993). Parentification level as predictor of self esteem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hispanic children.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B 54 (3),

p. 1695. (University Microfilms No. AAC 9317246)

Richie, C. (1986). The measurement of triangul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a questionnaire for adolescent responden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labama.

Ruble, D. N., & Martin, C.L. (1998). Gender development. In W. Damon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New York: Wiley.

Teyber, E. (1983). Effects of the parental coalition on adolescent emancipation from the family.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9 (3), 305-310.

Vogel, E. F., & Bell, N. W. (1968). The emotionally disturbed child as the family scapegoat. In N. W. Bell, & E. F. Vogel (eds.), A modern introduction to the family (pp.412-427).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West, J. D., Zarski, J. J., & Harvill, R. (1986). 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triangle on intimacy. Journal of American Mental Health Counselors Association, 8 (3), 166-174.

Wilson, R. J., & Rohrbaugh, M. (1985). Family triangles and college student adjust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Easter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262360).



附錄一 「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量表

	不 會 這 樣	有 時 這 樣	常 常 這 樣
1.我覺得爸媽會吵架都是因為我的關係。	1	2	3
2.照顧爸爸媽媽是我該做的事。	1	2	3
3.當爸媽爭吵時，爸爸(或媽媽)會要我和他同一國。	1	2	3
4.我覺得爸媽會吵架都是他們其中一個人的錯。	1	2	3
5.照顧兄弟姊妹是我該做的事。	1	2	3
6.當爸媽爭吵時，我覺得我一定要出來和解。	1	2	3
7.爸媽會因為討論我的問題而吵架。	1	2	3
8.如果我表現的再好一點（例如：考試考好一點），那麼爸爸 媽媽就不會吵架了。	1	2	3
9.當爸媽爭吵時，我要幫其中一個人講話。	1	2	3
10.我覺得爸媽會吵架都是我的錯。	1	2	3
11.當爸媽爭吵時，爸爸（或媽媽）會對我特別的嚴厲。	1	2	3
12.當爸媽爭吵時，爸爸（或媽媽）會覺得我故意和他們作對。	1	2	3
13.當爸媽爭吵時，我只能選擇和爸爸（或媽媽）同一國。	1	2	3
14.當爸爸媽媽爭吵時，我會分散他們的注意力。	1	2	3
15.我經常看見爸媽爭吵。	1	2	3
16.當爸媽爭吵時，我都只和爸爸（或媽媽）同一國。	1	2	3
17.爸媽會因為討論如何管教我而吵架。	1	2	3
18.爸媽對我管得太嚴了。	1	2	3
19.我要保護我的兄弟姊妹，讓他們不會受到爸媽吵架的影響。	1	2	3
20.當爸媽爭吵時，我會想很多辦法（例如：勸勸他們、討論其 他的事…）讓他們不要再繼續吵下去。	1	2	3
21.我很容易就和爸爸（或媽媽）吵架。	1	2	3
22.爸媽吵架時，我就倒楣了！	1	2	3
23.爸媽對我特別地嚴厲。	1	2	3

- | | | | |
|---|---|---|---|
| 24.我覺得我有責任要讓爸媽不要再吵架了。 | 1 | 2 | 3 |
| 25.我覺得我在家中的責任重大。 | 1 | 2 | 3 |
| 26.當爸媽爭吵時，我很容易就和他們其中一個人吵架。 | 1 | 2 | 3 |
| 27.當爸媽爭吵時，他們會向我說對方的壞話。 | 1 | 2 | 3 |
| 28.我是家中可以解決爸媽爭吵的人。 | 1 | 2 | 3 |
| 29.爸爸媽媽對待我的方式常常不一樣。 | 1 | 2 | 3 |
| 30.我需要站出來維持家中的和平。 | 1 | 2 | 3 |
| 31.只要我一做錯事（例如：打破東西、和兄弟姊妹吵架…），
爸爸媽媽就會吵架。 | 1 | 2 | 3 |
| 32.都是因為他們其中一個人（爸爸或媽媽）不好，他們才會
吵架。 | 1 | 2 | 3 |
| 33.我只喜歡爸爸或媽媽其中一個人。 | 1 | 2 | 3 |
| 34.我覺得我的家庭不能沒有我。 | 1 | 2 | 3 |
| 35.我覺得我好像是我的兄弟姊妹的爸爸媽媽。 | 1 | 2 | 3 |
| 36.照顧我的家庭是我應該要做的事。 | 1 | 2 | 3 |
| 37.我只和爸爸或媽媽其中一個人比較好。 | 1 | 2 | 3 |
| 38.爸媽爭吵時，他們會責備我。 | 1 | 2 | 3 |
| 39.我覺得爸媽會爭吵都是我造成的。 | 1 | 2 | 3 |
| 40.爸爸或媽媽會告訴我對方的祕密。 | 1 | 2 | 3 |
| 41.爸媽常會因為我的問題而意見不和。 | 1 | 2 | 3 |
| 42.爸媽的爭吵常和我做的事情有關。 | 1 | 2 | 3 |
| 43.爸爸(或媽媽)對我說他是世界上最愛我的人。 | 1 | 2 | 3 |
| 44.爸媽會因為我在學校中發生的事情而爭吵。 | 1 | 2 | 3 |
| 45.我覺得爸媽或他們其中一個人為我犧牲（例如：辛苦工作、
花很多的時間照顧我…）很大。 | 1 | 2 | 3 |
| 46.爸媽爭吵時會對我發脾氣。 | 1 | 2 | 3 |
| 47.我覺得爸媽的感情不太好。 | 1 | 2 | 3 |
| 48.在我的家中，我的問題最多。 | 1 | 2 | 3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iangle Operation in Parental Quarrels and Behavior Problems Among Children of Elementary School

Hung-Wen Chang & Li-An Kuo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triangle operation in parental quarrels and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s. 526 children completed the Triangle Operation in Parental Quarrels Scale and the Children Behavior Checklist (CBCL).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were as following: 1. Among the three dimension of triangle, boys only scored higher than girls in the dimension of scapegoating. Amo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behavior problems, boys scored higher than girls in the dimension of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and total behaviors. 2. Amo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riangle, the youngest in the family birth order scored higher than the oldest in the dimension of cross-generational coalit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of the birth order on behavior problems. 3. The scapegoating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ehavior problems. The parentification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behavior problems. However, there is no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ross-generational coalition and behavior problems. 4. The girls' internalizing, externalizing and total behavior scores can be effectively predicted by scapegoating and parentification. The boys' externalizing and total behavior scores can be effectively predicted by scapegoating and parentification. The boys internalizing behaviors can be effectively predicted by parentification. However, scapegoating and parentification predict opposite way. Higher scapegoating has more behavior problems. Higher parentification has less behavior problems.

The results are discussed, and suggestions were marked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professional counselors.

keywords: family systems theory ·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s · triangle · scapegoating · cross-generational coalition · parentification